

语言·文化·军事系列丛书

林骊珠 著

The Joining of Aristotle, God
and Marx:
A Study of Terry Eagleton's
Marxist Ethical-Political
Criticism

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政治批评研究
亚里士多德、上帝与马克思的邂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语言·文化·军事系列丛书

林骊珠 著

The Joining of Aristotle, God
and Marx:
A Study of Terry Eagleton's
Marxist Ethical-Political
Criticism



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政治批评研究
亚里士多德、上帝与马克思的邂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里士多德、上帝与马克思的邂逅：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政治批评研究 / 林骊珠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2

(语言·文化·军事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7083 - 0

I. ①亚… II. ①林… III. ①伊格尔顿, T. —伦理学—思想评论
IV. ①B561.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458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169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文学领域的伦理考量	(22)
第一节 恐怖与公正	(22)
第二节 欲望与法律	(29)
第三节 邪恶与死亡	(41)
第二章 神学伦理思想的政治解读	(48)
第一节 上帝与人类	(48)
第二节 耶稣与尘世	(54)
第三节 宗教与革命	(63)
第三章 精神分析学框架下的哲学思辨	(74)
第一节 想象界的情感	(74)
第二节 符号界的规约	(94)
第三节 实在界的欲望	(105)
第四章 特色与核心	(119)
第一节 人文主义的传统：人之德性	(120)
第二节 犹太—基督教神学的光环：爱的律法	(12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互惠发展	(130)

结论 (135)

参考文献 (140)

后记 (152)

绪 论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1943—) 出生在英国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个工人家庭, 父母都是爱尔兰人的后裔, 与伊格尔顿一样同为天主教徒。伊格尔顿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后曾先后执教于牛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 现为英国兰开斯特大学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文系荣誉教授。

伊格尔顿的学术研究从不囿于某个单一的领域, 且学术成果如万花筒般总是呈现出时时变换的鲜明景观。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流浪学术生涯以来, 伊格尔顿的学术研究涉及了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美学、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和文化批判、爱尔兰研究等几个主要的研究领域, 再到小说和戏剧创作以及对激进神学和伦理学的长期关注, 等等。正因如此, 伊格尔顿在英国学术界享有“流浪学者”之称。直到 21 世纪初, 特别是 2001 年“9·11”恐怖事件之后, 他的批评实践和理论反思开始明显聚焦于神学、伦理学等领域, 并且将他在这些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与政治问题紧密关联, 因此本书作者将他的这一学术转向定名为“伦理—政治”批评转向。伊格尔顿自这一转向以来接连出版了《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甜蜜的暴力: 悲剧的观念》(*Sweet Violence: The Idea of the Tragic*)、《神圣的恐怖》(*Holy Terror*)、《生活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与陌生人的麻烦: 伦理学研究》(*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理性、信仰和革命: 对上帝之争的反思》(*Reason, Faith & Revolution: Reflections on God Debate*)、《批评家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Critic*) 以及《论邪恶》(*On Evil*) 和《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 等一系列关于激进神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的批评著作。

本书主要围绕伊格尔顿的这些著作进行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其各部著作的细读和研究，深入分析和探讨伊格尔顿具有代表性但尚未受到充分关注的伦理批评实践案例及相关理论阐释，总结提炼出伊格尔顿学术历程的“伦理—政治”转向所涉及的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及伊格尔顿伦理观的特殊内涵，客观评价其贡献与局限，对目前伊格尔顿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进一步求证和厘清，努力将本书得出的结论与当前社会现实相结合，以期为今后的文学与文化批评研究提供帮助。

绪论部分将对伊格尔顿“伦理—政治”批评转向的缘起、历程及其批评实践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做一概括性的介绍，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说明本书的目的、意义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理论之后》是伊格尔顿“伦理—政治”批评转向的标志性著作，全书分为两部分，在前半部分伊格尔顿探讨了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得失，指出由于后现代主义一味追求个体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使得整个社会因价值和信仰的丧失产生了文化危机，同时更批判了其在面临政治问题时表现出的软弱和失忆。伊格尔顿指出，当战争、饥饿和贫穷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时，文化理论应当重新回到关于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去，正如他在该书前言中明确指出的：“正统的文化理论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我将努力阐述其原因并提出补救的措施。”^①

在该书中的后半部分，他的话题转向真理、德性、客观性、道德、革命、基础、原教旨主义以及邪恶、死亡与爱等与伦理学、神学以及政治学等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其访谈录《批评家的任务》中，当被问及《理论之后》一书的写作意图时，伊格尔顿所作的表述是“这本书差不多是有预谋地刻意地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

① [英]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前言。

越来越有意识地在为伦理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论战”^①。伊格尔顿还特别指出了他与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② 等自由主义者以及政治左派在伦理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他认为,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伦理问题可以作为政治的替代品,政治左派却又正好相反地用政治将伦理取代,而他关注的问题却是伦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③伊格尔顿认为,伦理涉及的诸多主题都是关于政治的,二者涵盖的领域既不能完全分开也不能完全合并。他将伦理与政治的关系概括为:伦理考虑的是人文价值、美德、人生目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行为的品质和动机等,而政治关注的正是那些能够促进或压制这些东西的物质条件、权力关系和社会制度。而且二者绝不能被简单视为精神与物质、内在与外在、个人与社会,或者是个体与普遍之类的对立关系,而是应被看作是对同一现实的两个不同的观察视角。^④在这一点上,伊格尔顿与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⑤ 的伦理观是一致的。

实际上,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伦理与政治就从来没有分开过。因为古希腊伦理思想反映的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欧洲先进民族的伦理精神,其主要特征是探求善的本质、普遍的行为法则和城邦公民应有的品德,在奴隶制的范围内寻求自由和公正的城邦秩序。^⑥可见,古希腊伦理思想是和城邦的政治秩序紧密相关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 的开篇第一卷 [善] 中告诉人们:最高善是最权威的科学或最大的技艺研究的对象,而政治学似乎就是

① Terry Eagleton, *The Task of the Critic*, London: Verso, 2009, p. 270.

②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法国哲学家、符号学家; 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 法国哲学家。伊格尔顿曾批评二者将伦理学与政治分开的伦理思想, 详见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Oxford: Wiley - Blackwell, 2009, pp. 223 - 259。本书将在第三章的第三节进行详述。

③ Terry Eagleton, *The Task of the Critic*, London: Verso, 2009, p. 270.

④ 详见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Oxford: Wiley - Blackwell, 2009, pp. 324 - 325; Terry Eagleton, *The Task of the Critic*, London: Verso, 2009, pp. 229 - 230; Terry Eagleton, *On Evi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4.

⑤ Aristotle (希腊语: Αριστοτ ελληζ, Aristotélēs, 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 古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⑥ 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6 页。

这门最权威的科学。因为正是这门科学规定了在城邦中应当研究哪门科学，哪部分公民应当学习哪部分知识，以及学到何种程度。^①

我国学者宋希仁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将伦理定义为一种客观的关系，是一种特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领悟和治理。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诠释，“伦”意味着辈分、等次、顺序；“理”是治理、整理、条理的意思。也就是说，只有形成客观的关系，再通过人为的有意识的调节，才能构成伦理关系。正是因为客观的物质性的关系要求有相应的道德观念和规范的调节，于是便有了相应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定。^② 由此看来，在中国伦理思想中伦理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与政治不可分割的联系。

事实上，在伊格尔顿看来，伟大的政治家马克思（Karl Marx）就是个绝对的伦理思想家，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亚里士多德的继承人，因为从亚里士多德、阿奎纳（Thomas Aquinas）^③ 到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④、马克思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⑤，伦理问题总是关乎着幸福的生活、丰富多样的自我实现，以及权力、享乐和能力发展，等等。^⑥

从《理论之后》到《与陌生人的麻烦：伦理学研究》等一系列批评著作，伊格尔顿一直致力于探索的问题就是“伦理与政治的关系”，将批评的焦点聚集在美德、爱与幸福、欲望与法律、恐怖与公正、宗教与革命、邪恶与死亡等主题，既包含对人之本性的关注，也是对全人类生存状况和世界政治秩序的思考。伊格尔顿在此所做的努力是试图通过伦理与政治联手以改变当前文化研究在面临政治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无能。于是，在世界政治局势日益紧张的今天，当真理与德性、爱与幸福、宗教与革命、邪恶与死亡等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6页。

② 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③ Thomas Aquinas (1225—1274)，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

④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德国最伟大哲学家之一。

⑤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

⑥ Terry Eagleton, *The Task of the Critic*, London: Verso, 2009, p. 229.

问题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的时候，伊格尔顿的学术历程中便适时地出现了“伦理—政治”批评转向。本书作者认为，伊格尔顿的这一转向应该就是他之前所指的“适应我们政治局势要求”的“补救措施”。至于他的这些“补救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文化理论的不足并解决文化理论“许诺要尽力解决却未能兑现诺言”的那些基本问题^①，本书将通过对他后期相关批评著作中的具体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来检验和求证。

如果说《理论之后》是伊格尔顿批评转向的标志，那么《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一书就是他的具体批评实践的开端。通过对悲剧的观念进行的一番深刻的理论阐述，他将悲剧与现代社会、神学、伦理以及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继这一开端之后，《神圣的恐怖》《生活的意义》《与陌生人的麻烦：伦理学研究》《理性、信仰和革命：对上帝之争的反思》，以及《论邪恶》等著作接连出版，伊格尔顿的“伦理—政治”批评领域又逐渐扩大到了神学和哲学领域。然而无论他的批评研究关注的焦点如何变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和深厚的文学造诣使得他的批评目光从来没有脱离过文学领域。在他近10年的“伦理—政治”批评研究过程中，文学仍然是他批评实践的主要领域之一。除《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外，在此期间他还陆续出版了《英国小说》（*The English Novel: An Introduction*）、《怎样读诗》（*How to Read a Poem*）和《文学的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②等其他关于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的著作。除此之外，即使是在文学之外的其他领域进行思辨与论战时，伊格尔顿也总是习惯选择以文学作为切入点，通过选取适当的文学作品作为批评实践的范例，以将他的思想和观点深入浅出地展示给读者。例如，在他为伦理和政治的关系进行神学与哲学思辨的《神圣的恐怖》《与陌生人的麻烦：伦理学研究》和《论邪恶》这三部作品中，伊格尔顿分别从古

^① [英]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8页。

^② 详见 Terry Eagleton, *The English Novel: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5; Terry Eagleton, *How to Read a Poem*, Oxford: Blackwell, 2007; 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和英国小说中选取了一些与主题相关的作品，如《酒神的女伴》（*The Bacchae*）、《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Oedipus at Colonus*）、《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品彻·马丁》（*Pincher Martin*）和《密探》（*The Secret Agent*）^①，等等。凭借文学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伊格尔顿对人性中的善、恶、欲望、意志等进行了深刻的伦理剖析，并从这些作品中提取出了具体的论据，以支持他的伦理观点和政治立场。本书将重点关注伊格尔顿这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过程，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来审视他的批评特色和伦理观点。

二

神学是伊格尔顿“伦理—政治”批评的另一个主要战场。《神圣的恐怖》与《理性、信仰和革命：对上帝之争的反思》是伊格尔顿关于激进神学的两部批评著作。自20世纪中期写作《新左派教会》（*The New Left Church*）和《作为语言的身体》（*The Body as Language*）^②这两部关于神学的著作之后，伊格尔顿的研究重点曾一度转至别处，“9·11”之后他又再次给予了神学格外的关注，称之为“神学转向”^③。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伊格尔顿的神学研究从来都不是关于上帝是否存在或世界起源的问题，而是基督教^④伦理思想中对人类革命和解放所具有的政治启示以及对极端的宗教激进主义（Islamic

① 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英文名称及年代分别为：Euripides, *The Bacchae*, 405 BC; Sophocles, *Oedipus the King*, 431 BC, *Oedipus at Colonus*, 401 BC; Shakespeare, *Measure for Measure*, 1604, *The Merchant of Venice*, 1596-1597; William Golding, *Pincher Martin*, 1956; Joseph Conrad, *The Secret Agent*, 1907。

② 详见 Terry Eagleton, *The New Left Church*, London: Sheed & Ward, 1966 和 Terry Eagleton, *The Body as Language*, London: Sheed & Ward, 1970。

③ Terry Eagleton, *Holy Terr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reface.

④ 本书中所指的基督教是指国际上对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统称。而中国国内所指的基督教则专指新教，民间又称“福音教”或“耶稣教”，因此与天主教、东正教区别开来。

fundamentalism)^①的批判，因而属于“激进神学”。

在伊格尔顿“伦理—政治”批评转向中出现对神学的特别关注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这其中首先要提到神学与伦理的关系。基督教神学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封建专制主义和教会神学的统治下，中世纪的伦理思想得以发展，它的基本任务是解释和论证《圣经》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原则，注重个人对上帝的关系和灵魂拯救，形成了适应封建领主和教会统治需要的神学伦理思想体系。^②由此可见，神学存在的最初意义和作用与任何其他历史时期的伦理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对人的道德、精神、行为本质和目的等所做的规定和阐释，是适应其所处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统治需要的，因而也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伊格尔顿本人出生在天主教徒家庭，少年时期曾在一家女修道院里做祭坛侍者，同时担任修道院礼拜堂的看门人^③，这一家庭背景和早期经历使得他与神学自然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只不过在青年伊格尔顿眼中神学更多地具有正面积极的作用，而随着阅历的增长以及政治历史的转变，他越来越注意到了基督教信仰中那些更为阴暗的层面。正是对这些阴暗层面的认识，使得他后期的神学研究显得更为深刻和辩证。

伊格尔顿“神学转向”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术气候的变化。如果说当初他在政治左派最辉煌的时期写作《新左派教会》显得另类，那么如今的政治局势和学术氛围就使神学思考变得适

① 作为一种宗教社会思潮，宗教激进主义最早兴起于18世纪，后来被立为沙特阿拉伯王国“国教”(state religion)的瓦哈比派教义是原教旨主义的早期形态。但瓦哈比派教义没有现代思想，而与现代的宗教激进主义有所区别。现代原教旨主义兴起于20世纪，始建于1928年，颠峰时曾拥有百万信徒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20世纪至今最有影响的宗教激进主义派别组织。世界各地原教旨主义派别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互相合作使原教旨主义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因而原教旨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泛伊斯兰主义，其联系纽带即共同的伊斯兰教价值观。宗教激进主义以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为本质特征，是与现代改良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宗教社会思潮。主流的原教旨主义派别主张开展合法斗争，希望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就伊斯兰而言，也就是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形态。它与恐怖主义关系密切，从宗教角度称为极端主义，从政治、法律角度称为恐怖主义。详见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4—20页。

② 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③ 详见 Terry Eagleton, *The Gatekeeper: A Memoir*, London: Allen Lane, 2001.

宜多了。自“9·11”以来，学术界围绕着“上帝”、“原教旨主义”和“邪恶”等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巴迪欧（Alain Badiou）、齐泽克（Slavoj Žižek）^①等哲学家的影响下伊格尔顿开始了对神学的重新思考。伊格尔顿认为，学术界之所以又开始谈论上帝的唯一原因就是出于对宗教激进主义的恐惧，他甚至怀疑如果世贸大厦现在依然矗立着，那么就不会有如此激烈的关于上帝的讨论。^②在《神圣的恐怖》中，伊格尔顿对恐怖主义进行了一种纯哲学的和神学的研究，从古代习俗仪式、中世纪的神学，到现代哲学中的“崇高”（sublime）、“自由”概念以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the unconscious）、自杀、死亡、替罪羊（scapegoat）等多个角度追溯了恐怖主义的发展谱系，通过从一种更根本的意义上对恐怖主义的根源进行剖析，指出上帝神圣的律法是“爱”而不是恐怖，消除恐怖的途径是“公正”而不是赶走上帝。

自从牛津大学生物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美国作家克里斯多夫·希更斯（Christopher Hitchens）相继出版了批评宗教信仰的专著《上帝的欺骗》（*The God Delusion*）和《上帝并不伟大》（*God is Not Great*）^③之后，伊格尔顿便与以此二人^④为代表的学者们展开了一场关于上帝的辩论，辩论的中心仍然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辩证地分析了理性与信仰对人们以及世界分别产生的影响。经过对这一场论战的深刻反思，2009年伊格尔顿出版了著作《理性、信仰和革命：对上帝之争的反思》。在书中他一方面为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对人类解放具有的革命启示进行了辩护，同时也对当今的宗教对其革命初衷的违背进行了批评。例如，针对道金斯等人认为宗教信仰教唆人们轻视家庭的观点，伊格尔顿辩护的

① Alain Badiou (1937—)，法国哲学家；Slavoj Žižek (1949—)，斯洛文尼亚哲学家。伊格尔顿谈论二人对他“神学转向”的影响详见 Terry Eagleton, *The Task of the Critic*, London: Verso, 2009, p. 277。

② Terry Eagleton, *The Task of the Critic*, London: Verso, 2009, p. 229.

③ 详见 Richard Dawkins, *The God Delus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6; Christopher Hitchens, *God is Not Great*, London: Atlantic, 2007.

④ 伊格尔顿在《理性、信仰和革命：对上帝之争的反思》和《论邪恶》等书中将此二人讽刺地合称为道希金斯。

理由是“正义重于亲情”^①。同时，他也指出当今社会的宗教只是为受压迫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而并不是委以他们变革世界的使命。^②另外，他还认为在当代重新兴起的宗教都带有政治的形式，“宗教这个曾帮助被市场驱逐的精神价值找到避难所的东西如今已变得非常具有防御性、带有妄想狂和半病态了”。^③同样，对于理性伊格尔顿也给予了辩证的批判，指出理性在促进世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广岛。对此他借用了尼采的观点：上帝死了，人们就可以接过他手中的绝对权威去纵情肆虐制造毁灭。^④

关于理性与信仰作为变革世界的两种力量的权衡，伊格尔顿在《论邪恶》一书中作了更深刻的分析，指出人类用无限的意志取代上帝的永恒这一交换并不值得。^⑤他将代表理性和信仰的两个最显著的形式——纳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分别进行了剖析和比较后指出，纳粹主义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因为纳粹主义者以从屠杀灭绝他者的行动中获得荒诞淫秽的快感作为证明自己仍然存在的唯一途径，这一点与宗教激进主义并无异处。^⑥

从中世纪开始，基督教神学伦理学研究中就包含着关于人性之“恶”的讨论，近代的神学和伦理研究一直也都关注着“邪恶”问题^⑦，“9·11”恐怖事件之后，“邪恶”一词便与“上帝”、“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⑧。一方面由于这一学术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伊斯兰

① Terry Eagleton, *Reason, Faith, and Revolution: Reflections on the God Debat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1.

② Ibid., p. 41.

③ Ibid., p. 46.

④ Ibid., p. 15.

⑤ Terry Eagleton, *On Evi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5.

⑥ Ibid., p. 100. 伊格尔顿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宗教激进主义恐怖分子也是以死亡体现自己生命的存在和意义的。

⑦ 详见 Richard Swinburne, *Providenc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olin McGinn, *Ethics, Evil, and Fi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⑧ 详见 Richard J. Bernstein, *Radical Evil*, Cambridge: Polity, 2002; Brian Davies, *The Reality of God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 2006; Peter Dews, *The Idea of Evil*, Oxford: John Wiley, 2007.

人的同情以及对于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的呼吁，伊格尔顿在《论邪恶》一书中从人性的角度对“邪恶”概念进行了伦理分析。他刻意地将“恶”区分为两种：邪恶与罪恶。^①“邪恶”是指无法劝诫的纯粹的恶，因为它是无目的、无理由的，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动机，它与上帝一样无须任何理由而存在，拒绝因果关系。相比之下，“罪恶”却是可以协商的，随着条件的改变是可以消除的。^②伊格尔顿更愿意将伊斯兰恐怖主义划分进罪恶的范畴，他认为假使西方起初选择以另一种方式对待伊斯兰国家的话，也许我们所目睹的那些灾难至少可以部分避免。在他看来，恐怖主义更深刻的根源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伊斯兰民族的政治蹂躏，应该归于政治的而不是纯粹伦理的范畴，更不应归罪于上帝；另外，伊格尔顿在书中也特别说明了他对恐怖主义的这一剖析并不意味着为其辩护，他明确指出宗教激进主义的恐怖行为只能将事态弄得更糟。但若是将其简单冠以“邪恶”之名便否认了伊斯兰民族对西方的仇恨之源，更是将事态进一步恶化，因为对待邪恶而全无理性的野蛮恐怖唯一的办法就是诉诸更多的暴力。这更多的暴力继而又引发更多的恐怖，最后的结果就是殃及更多的无辜。在该书中，伊格尔顿再次表达了对建立和谐公正世界秩序的呼吁：“上帝为何就不能创造一个别样的宇宙，让其中一类事物的繁荣不再与他类事物的兴旺冲突？为何我们的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充斥竞争的自由市场？”^③由此可见，伊格尔顿在神学领域的伦理批评实践仍然是与当今的社会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在这一过程中对上帝的权威、人类的意志、耶稣基督对尘世的影响以及宗教与革命的关系等方面的阐述将成为本书关注的重点。

三

《与陌生人的麻烦：伦理学研究》是伊格尔顿的“伦理—政治”

^① Terry Eagleton, *On Evi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57. 这两个词在书中的英文是 the evil 和 the wicked.

^② Ibid., p. 84.

^③ Ibid., p. 141.

批评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他对近代西方的一系列伦理思想进行的哲学反思和理论探究，这一哲学反思是在拉康（Jacques Lacan）^①的精神分析学语境和框架下进行的，即用了拉康对主体的形成过程所划分的三个范畴概念——“想象界”、“符号界”和“实在界”^②，这是伊格尔顿在这本书中最显著的创新之处，这一创新的举措在于巧妙地使用了“他者”的概念。在该书中，伊格尔顿将伦理问题概括为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与“他者”中的那些或是在物理空间上远离我们，或是与我们不同民族、文化相异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在拉康精神分析学中，主体也是通过“他者”的出现和存在而逐渐形成的，这一过程分为“想象界”、“符号界”和“实在界”三个阶段。首先，当一个6—18个月大的婴儿^③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影像并发现这个影像能够受自己行动的控制时，意识中便出现了一个想象出来的“他者”，同时在这个“他者”的对照之下开始有了“自我”的主体概念，这时的“自我”和“他者”是相似的并且统一的，这个阶段被称为“想象界”。^④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在成年之后进入社会，开始面对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和秩序，需要对自己的情感、欲望和行为进行限制和规约，拉康将这些关系和秩序称为一个大写的“他者”，主体就在这个大写的“他者”的制约下逐渐形成，进入“符号界”。这时的主体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而是像一个能指符号，进入了一个主体间的符号结构中，受到各种关系——“他者”的制约，主体与这个“他者”不再是统一，而是对立割裂开来，宛如脱离了母体怀抱的婴儿。^⑤相比“想象界”和“符号界”，“实在界”是一个最难表征的范畴，它存在

① Jacques Lacan (1901—1981)，法国精神分析学家。

② 这三个范畴的英文分别为：the imaginary, the symbolic, the real；也有译作想象界的、象征界和现实界的，本书中采用的是方杰在中译本《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中的译法。详见[英]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方杰、方宸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③ 拉康将这个时期称为“镜子阶段”。详见[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96页。

④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Oxford: Wiley - Blackwell, 2009, pp. 1 - 11.

⑤ Ibid., pp. 83 - 90.

于“符号界”内部的一个断裂之处，是由主体内部的一股不可控制的力量冲破了符号秩序的制约所形成的，这股力量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纯粹欲望，在这种无尽的欲望驱使下主体不断地超越自我，追求无限和永恒，它的终点便是死亡和空虚。这种不断驱使着主体的无尽欲望便是“实在界”的他者，它既不是由主体想象而出，也不是由符号秩序规约而成，而是基于“人类由血肉之躯构成”这一存在现实，正是因为这个现实，人类不可避免地有着饮食之需和受着死亡的限制，同时也无法抗拒地受到情感、意志和欲望的驱使。因此，“实在界”的“他者”是从主体自身中分裂出来的且永远无法被自我征服，类似于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①、尼采哲学中的“意志”（will）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② 理论中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它具有双重的潜在力量，在特定情况下一方面可能会给生命带来救赎和解放，另一方面则可能通向邪恶、毁灭和死亡。^③

根据拉康精神分析学的这三个范畴各自的属性和特点，伊格尔顿将近代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各阶段代表人物的伦理思想相应地归入到这三个范畴之中，分别称为想象界伦理学、符号界伦理学与实在界伦理学。其中想象界伦理学的代表人物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休谟（David Hume）、伯克（Edmund Burk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英国 18 世纪哲学家^④；符号界伦理学的代表是斯宾诺莎（Benedictus de Spinoza）与康德（Immanuel Kant）^⑤；实在界伦理学的代表是叔本华、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⑥、尼采、列

①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德国哲学家，意志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② Sigmund Freud (1856—1939)，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

③ 详见 Terry Eagleton, *Trouble with Strangers: A Study of Ethics*, Oxford: Wiley - Blackwell, 2009, pp. 139 - 153 和 Terry Eagleton, *The Task of the Critic*, London: Verso, 2009, pp. 301 - 302。

④ 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苏格兰哲学家；David Hume (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Edmund Burke (1729—1797)，爱尔兰政治家、哲学家；Adam Smith (1723—1790)，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

⑤ Benedictus de Spinoza (1632—1677)，荷兰哲学家，西方近代哲学史上重要的理性主义者；Immanuel Kant (1724—1840)，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者。

⑥ 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丹麦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